

# 诗经论略

许志刚 / 著

辽宁大学出版社



**许志刚** 1944年生，吉林人。1969年毕业于辽宁大学中文系本科，1981年于辽宁大学获文学硕士学位，1986年于东北师范大学获文学博士学位，现任辽宁大学中文系教授。主要社会兼职有：中国诗经学会理事、中国旅游文学研究会理事、辽宁省文学学会副理事长、辽宁省唐代文学学会副会长。主要著作：《诗经胜境及其文化品格》、《严羽评传》、《赋史英华》、《历代赋辞典》（合著）等。

---

---

# 目 录

## 上编 《诗经》与周代的礼乐文化

一、 本世纪对《诗经》的评价及若干理论问题	
一、风雅与《诗经》胜境·····	3
二、对《诗经》研究中的传统观点的检讨·····	4
三、对几个理论问题的思考·····	11
(一) 文学研究中的取舍倾向与求实精神·····	12
(二) 《诗经》文本的历史客观性与文学史方法论·····	14
(三) 文艺创作与精神生产的特点·····	16
二、《诗经》所展现的和谐之美	
一、周代人性格的基本特征·····	20
(一) 外在环境对周代人的制约·····	20
(二) 周代人与外在环境和谐的本质·····	23
(三) 周代人性格的内涵·····	26
二、周代诗歌中“人格美”理想的艺术显现·····	34
(一) 外显为威仪的“人格美”·····	35
(二) “内美”的直接显现·····	42
(三) “人格美”的典范·····	48
三、理想化的社会生活·····	54
(一) 臣属的依赖之情·····	54
(二) 敬让惠下的君主之意·····	61
(三) 饮食思礼、示民训则的精神往还·····	66
三、周代人的诗情与礼乐文化	
一、周代的情礼关系与周代人的性格·····	72

(一) 情在礼的规定中得到表现·····	72
(二) 礼对情的排斥与否定·····	76
(三) 礼对情的排斥的有限性·····	82
二、礼所熔铸的情感与心灵·····	84
(一) 庆典礼会中的感受·····	85
(二) 思想交流与感情交融·····	89
(三) 具有依赖性的感情·····	94
三、诗情及其对礼的排拒·····	98
(一) 公义与私情·····	98
(二) 礼的相互制约的规定与人们的感情·····	104
(三) 现实生活的感发及其对礼的离异倾向·····	108
四、周代思想家的心灵与艺术	
一、周代思想家的思想与礼·····	116
(一) 周代思想家的心灵与礼·····	117
(二) 周代思想家的独立性与人臣之义·····	120
(三) 周代思想家思想、性格的两重性·····	128
二、忧心忡忡的孤独者·····	135
(一) 被排挤的孤独者·····	135
(二) 预见与忧虑·····	140
(三) 乱离中的忧国忧民之心·····	147
三、忠贞的情感与兼济之志·····	152
(一) 强烈的责任感·····	154
(二) 对礼的坚贞不贰的信仰·····	161
(三) 尽忠竭诚的态度·····	167
五、诗人自我张扬的主观因素与客观因素·····	174
一、社会生活与诗人的性格·····	174
二、礼对艺术创作的规定与诗人的生活感受·····	179
三、诗人的境遇与礼的修养·····	185

## 中编 《诗经》与周代宗教文化

六、蒙昧的诗情 .....	191
一、奇幻的精灵世界与蒙昧的乐歌 .....	192
二、精灵世界的艺术表现 .....	196
三、巫、祝与早期文学创作 .....	204
四、神圣的诗情 .....	208
七、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之歌 .....	213
一、敬礼社稷神的情感与乐歌 .....	215
二、对百谷之神后稷的敬仰之歌 .....	220
三、对田祖（即农神）的礼赞 .....	223
四、美好生活的多重愿望与祭神曲 .....	227
八、消弭灾难的渴望 .....	234
九、同祖同宗的自豪 .....	239
十、神前的反思、自责与自励之歌 .....	247
十一、宗教仪式的快感 .....	256
十二、神坛前的欢悦 .....	266

## 下编 《诗经》文本、语境及其他

十三、风诗的爱、恨与地缘文化 .....	277
一、周代的礼对爱情的制约 .....	277
二、王化之国的情与礼 .....	279
三、周王朝礼乐文化同地域文化的交融 .....	283
四、部族文化传统及其同礼乐文化的冲突 .....	286
十四、风诗的批评、讽刺及其语境 .....	294
一、鼠之皮与人之仪 .....	294

二、“罔极”、“无良”与礼 .....	296
三、“不稼不穡”、“不狩不猎”与君子“无逸” .....	299
十五、《诗经》中对事理的误读与诗歌艺术的	
无理而妙 .....	303
一、《诗经》中对事理的误读与艺术表现 .....	303
二、诗人对史实或地理之类误读及其艺术表现 .....	308
三、艺术构思中的无理之理 .....	312
十六、春秋赋诗与对《诗经》的解读 .....	319
一、《诗》的多种方式的解读 .....	319
二、“赋诗断章”与“歌诗必类” .....	323
三、解诗、论诗、论乐 .....	335
十七、《诗经》正读十则 .....	342
一、“鄂不辚辚” .....	342
二、“执讯获丑” .....	342
三、“宜岸宜狱” .....	343
四、“怒焉如捣” .....	343
五、“僭始既涵” .....	344
六、“至于已斯亡” .....	344
七、“上帝甚蹈” .....	345
八、“维此王季” .....	345
九、“假乐君子” .....	346
十、“辞之怿矣，民之莫矣” .....	346
十八、考古发现与《诗经》传本 .....	348
一、名篇义例与篇题、国别等标识 .....	348
二、诗篇次第 .....	353
三、章句 .....	358
附录 参考书籍、论文目录 .....	361
后 记 .....	367

---

上 编

**《诗经》与周代的礼乐文化**

---

---

---

# 一、本世纪对《诗经》的评价 及若干理论问题

## 一、风雅与《诗经》胜境

西周是中华民族文化传统形成时期，也是中国文学的民族性特征确立的时代。因此，研究这一时期的文学创作的艺术水平和文学规律，对于深入了解中国文学的历史规律及文学的相关规律，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周代是中国古代诗歌创作的第一个繁荣的时代。这个时代产生了数量众多的作品。据说此时的作品流传到几百年后，尚有三千余首<sup>①</sup>。仅就现在所看到的《诗经》三百篇来说，无论在中国古代还是在全世界早期文明的国家，都是先民留下的当之无愧的瑰宝。它们体现出高度的艺术表现力；为后来的文学特别是诗歌的创作，提供了较为成功的经验；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文学遗产。

周代诗歌创作的成果集中体现在《诗经》中。《诗经》中的商颂是商王朝的祭歌，大雅中的《生民》、《公刘》、《緜》等为早期诗篇，小雅中的《何草不黄》、《我行其野》等少数作品以及国风中的部分作品属于下层劳动者的诗篇，其余绝大多数诗篇均为周代贵族所作。本编对周代诗歌同礼乐文化的研究，便以上述贵族作品为对象，尤以大雅、小雅为主。

《诗经》中这些贵族创作的诗篇形象地表现了周代贵族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内心世界：他们的个性与思想感情，他们与

---

<sup>①</sup> 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

外在环境的和谐、矛盾与冲突，他们对人生与生活理想的追求；艺术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体现了周人的艺术理想和较高的艺术修养。这些作品在塑造周代抒情主体的艺术形象，表现周人感情的丰富性方面，或者在展现周人个性的历史性内涵方面，都达到了相当的艺术高度。在诗歌意象的创造，文学语言的运用，各种文学表现手段的运用方面，《诗经》都成为中国文学早期发展成熟的标志，也为后世文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因此，研究周代诗歌的艺术成就，研究中国诗歌早期发展的状况与规律，都应将《诗经》中这些作品特别是大雅、小雅中的这些作品置于首位。这些作品是周代文学中艺术成就最高的部分，是中国在世界文化史、文学史上早有建树的鲜明标志。

## 二、对《诗经》研究中的传统观点的检讨

截至清代为止的《诗经》研究，基本上是经学的组成部分，其间虽有汉学、宋学代胜，却终不过是经学内部的派别之争，在把这部以周代诗歌为主的诗集，当作阐述封建统治思想的经典这一基本认识上，他们是没有分歧的。这种传统观点已经随着封建王朝的覆灭，而为历史所淘汰。现在，公开奉行这种观点的，已属少数，因此不在本文讨论范围之内。

本世纪的《诗经》研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它彻底打破了作为经学组成部分的《诗经》研究的格局，扫清了两千年来堆积于《诗经》之上的封建尘垢，还《诗经》以本来面目。《诗经》作为周人抒情言志的文学文本而进入了欣赏和研究的视野。这是几代人勇敢探索的光辉业绩，是本世纪《诗经》研究所取得的最大成功。

然而，当我们要推进《诗经》研究的时候，当我们回首本世纪《诗经》研究的经验、教训，而探讨新世纪应有的《诗经》研究的格局的时候，仅仅看到某些辉煌是远远不够的。我们还应该

同时也必须看到本世纪那些限制、束缚《诗经》研究向着更高水平发展的问題之所在。这就是本文的出发点。

因此，这里所要讨论的，不是本世纪《诗经》研究的全部过程和重要贡献，也不想对几代学人艰苦探索的宝贵经验和知识积累进行全面的总结。本文的宗旨在于探讨突破《诗经》研究现有格局的途径、方法。从而将研究的视点聚焦于本世纪特别是近几十年来影响较巨，几乎衍为成见的作法与认识，即新的传统观点。

多少年来，在周代诗歌的研究中，人们往往忽略了作为文学特征的艺术形象，忽略了与这形象密切相关的当时的社会生活和主体精神的时代特征，以及这些艺术形象塑造中的精粗成败。在许多评论中，同作品及其艺术形象关系很小。甚至完全不相干的因索，例如所谓的被剥削阶级的阶级意识的觉醒，阶级仇恨的火焰，对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揭露等，竟然变成研究的前提和出发点。毫无疑问，文学作品是人类精神生产的产物。然而，它既经产生，便成了人类历史活动的创造物，因而获得了客观的性质。人们常常无视或者忽视这一点，而以“头脑中臆造的联系来代替应当在事变中指出的现实的联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340页）。于是，本来同周代的藉田、贡赋、木主、明堂、多妻生活等等密切相关的丰富生动的内心世界，似乎变成了用超现实的模式稍事度量便可明了的简单僵化的存在物。特定环境下的精神生产的结晶，变成了超历史条件下生产的标准件。

《诗经》研究中的传统观点，可以追溯到本世纪初的白话文学运动时期。胡适在《白话文学史》中首先提出的白话文学和古文学、平民文学和庙堂文学、活文学和死文学的对立。他说：“白话文学史就是中国文学史的中心部分”，是中国文学史上“最热闹，最富有创造性，最可以代表时代的文学史”。在这部书中，他并没有对《诗经》作全面的、具体的论述，然而，他从“白话文学与古文学”等三组对立的提法中演绎出对《诗经》的基本认

识，他直截了当地概括说：“古代的文学如《诗经》里的民歌也都是当时的白话文学”。他没有说到雅颂，但其看法已经不言而喻。

胡适这部著作撰写于 20 年代后期。当时白话文运动方兴未艾，从历史上为白话文学找出证据，指出它的生命力和成就，对于粉碎封建文化，促进这场斗争的胜利，具有不容置疑的进步意义。但是，今天，我们也不能不看到，这种提法并不是基于对中国古代文学的深入研究而得出的结论。如果把为了推动当时的运动而概括出的某些提法误认为对文学史的科学总结和正确论断，则未免过当，实际上，人们很少区分二者的不同。除了白话文学、古文学，活文学、死文学的提法随着白话文运动的结束而不再使用以外，这部书中认识问题、论证问题的方法，关于平民文学与庙堂文学对立的观点等都被承袭下来。到了 40 年代，有人说：“一部文学史也就是人民文艺与庙堂文艺的斗争史”，“歌功颂德的庙堂文艺”，“它走的路必然是趋向死亡的路”，“所有为少数人享受的歌功颂德的所谓文艺，应该封进土瓶里把它埋进地窖里去”。<sup>①</sup> 这里与前而所引用的《白话文学史》的有关部分，只有词句上的不同而已，“平民文学”、“庙堂文学”变成为“人民文艺”、“庙堂文艺”，“死文学”变成了“趋向死亡的路”，至于基本观点和认识问题的方法，则毫无二致。在当时的形势下，作为一种文艺主张，号召人们向往光明，反对黑暗；趋向进步，抵制反动，也有积极的进步的作用。诚然，这里未尝谈到《诗经》，但对《诗经》的基本认识，从来都是人们的文学观、文学史观的具体体现。事实也正是如此。到了 50 年代，这些关于“人民文学”、“庙堂文艺”的提法，已经不仅仅作为文艺主张以资号召，

---

① 见郭沫若：《人民的文艺》，载《沫若文集》第 13 卷，人民文学出版社 1961 年。

而是成了对中国古代文学的基本认识，并由此演绎出对《诗经》的基本看法。文章说：“民间艺术的生命，比贵族艺术或宫廷艺术的生命更丰富、更活泼，因为风的价值高于雅”。在这里“平民文学”和“庙堂文学”再度改换几个字，就变成了对《诗经》中风雅二体的认识。作者又说：“在今天看来，最有文学价值的是国风”。周颂“拿文学价值来说，却是最无聊的。雅颂和国风不同的地方，主要是采自宗庙朝廷的贵族文学”。<sup>①</sup>

如果说前面所列举的“人民艺术”与“庙堂艺术”的提法，作为当时文艺运动中的号召而具有现实的进步意义的话，那么，在专门谈论《诗经》的时候，不从对一代诗歌的全面深入的研究中概括出新的认识，而继续以既有模式推演出对《诗经》的论断，其探讨问题的方法与对问题的基本认识便很难具有科学性，也很难合于文学的历史实际。

导致《诗经》研究中的传统观点的形成的，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即由前苏联传入的文艺学观点，特别是关于“艺术上的人民性”的观点。

依据这个理论，首先要确定古代作家的阶级属性。因为据说：“直接形式中的人民性”“首先表现在这样一些所谓人民创造的作品中”。<sup>②</sup>“人民大众自己的艺术创作构成艺术上人民性的基础”。<sup>③</sup>至于不属于人民大众即劳动人民这个范畴的艺术家，则依其思想倾向性判断其是否具有人民性。

由于我国同前苏联之间的特殊的历史关系，在当时的文学研

---

① 见郭沫若：《简单地谈谈〈诗经〉》，载《奴隶制时代》，新文艺出版社1952年。

② 见〔苏〕顾尔希坦著 戈宝权译：《文学的人民性》，天下图书公司1949年。

③ 《论艺术上的人民性问题》，原载《苏联大百科全书》，《光明日报》1956年3月8日转载。

究界看来，这个观点既然来自一个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和较高的理论修养的国度，其正确性似乎不必怀疑，也不容许怀疑。同时，又有我国自己的从二三十年代便逐渐形成并坚持下来的认识，这内在的与外来的认识很容易地融为一体，使我国古代文学研究界固有的认识获得了新的理论的外观。从此，《诗经》研究中的新的传统观点便获得了更加稳固的地位，也形成了更加简便易行的“研究”模式。

例如有些学者在肯定《诗经》的成就时说：“这主要是指它的那些最好的诗篇，即‘国风’部分而说，我们只要知道这些都是民歌民谣和民间诗人的作品，则它所以”“联系着人民性，也是很容易了解了”。<sup>①</sup>也有的说，《诗经》中的“劳动人民”的作品，“表达了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和他们对社会生活的认识，同时也显示了劳动人民的艺术创造才能”，“都具有强烈的人民性”。<sup>②</sup>

在这些论述中隐含着—个共同的公式，即作者的阶级属性等于作品的“人民性”，亦即等于作品的艺术性。于是，人们在《诗经》研究中所要探讨的对其艺术形象与艺术规律的探索被代之以对作者的阶级出身的简单的划分。那些一向给人以美的享受的艺术形象、诉诸人们情感的艺术品，在这些简单化的研究中，失去了它们作为艺术品的独特性质，而被混同为表现阶级意识的一般的文献资料，被视为与政治宣言、法令条文、经济账目乃至卖身文约等没本质区别的、反映古代阶级利益和阶级关系的普通文献。

“艺术上的人民性”的理论不仅改变了古代文学作品作为艺术美的载体的性质，而且规定了基本的研究方法。它要求将混同

---

① 见冯雪峰：《中国文学中从古典现实主义到无产阶级现实主义的发展的一个轮廓》，载《新华日报》1952年第11期。

② 游国恩等：《中国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

于一般观念材料的周代诗歌，离析为内容与形式两部分。这内容绝不是艺术形象的得自当时社会生活和创作主体的心灵的内涵，而是从字里行间抽象出的思想性条文。那些被宣布为不具有人民性的作品侥幸地避免了肢解之苦。另外一些据说较为优秀的作品，则如医学上供做解剖用的尸体一样，被“理论”分解开来，以便见出主题思想，所反映的社会的现实，所表达的愿望，所具有的理实意义等等。至于被称为优秀作品的是怎样由作者的感受、激情，转化为感人的诗篇，它在当时以及后世的审美价值如何？它是怎样产生的？它为什么能使几千年后的读者愉悦、紧张、忧愁、愤慨？这一系列属于文学研究范围内的重要课题，却均被置于《诗经》研究之外。

通过对《诗经》研究中的传统观点形成过程的追溯，不难发现一些有碍于《诗经》乃至古代文学研究的积弊。其中有三点值得特别注意。

#### 第一，对文学的性质的认识

人们以对作者阶级出身和政治倾向的简单的划分，代替对作品进行艺术分析的作法，表现出对文学性质的不够正确的认识。诚然，作家是有倾向性的，但这是作者对生活作出审美评价和进行艺术创作时的倾向性。人们的作法并不是对艺术中的倾向性的研究，而是以所谓的倾向性取代艺术，把艺术形象当作政治观念的图解，把非艺术的、超越历史条件的教条强加于古人。这样就极其片面地夸大了政治、哲学、宗教等对艺术的影响，抹杀了文学艺术同意识形态其他形式，特别是同政治的区别，把它变为政治的侍婢。

在这些认识中，虽然使用了一些现代词汇，但如果透过表面现象，就可以看出，在对文学的性质的认识上，现今的《诗经》研究中的传统观点同封建社会的经学的《诗经》研究，甚至同周代的礼乐观，都具有内在的一致性。

周代的礼乐观把艺术当作实现礼的宗旨的工具和手段，于是

便认为“礼乐刑政，其极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礼记·乐记》）由此，便否认常人在艺术中表现自己的感情，对生活进行审美评价的权力；同时，又把艺术当作先王为了“出治道”而主观制作之物，所谓的“先王耻其乱，故制雅颂之声以道之”（同上），就是这一观点的经典表述。作为经学组成部分的《诗经》研究，继承并发挥了周代的礼乐观中的教化观点，认为诗是先王用以“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毛诗序》）的工具，从而把艺术当作政治的附庸。

今天的《诗经》研究中的传统观点，虽然抛弃了先王、圣道之类封建话语，但在把艺术当作政治的附庸这一基本主张方面，却并无本质的区别。只不过把先王换成了众人，把“出治道”变成了阶级意图。这样就不可能正确认识文学艺术的特点。

## 第二，理论上的盲目性

由于我国长期处于封建禁锢之下，由于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所导致的中国近代历史的特殊形态，我国缺少欧洲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中那样大批的思想界、理论界的勇士，缺少他们那种富有个性的、严格的探索精神，因而在理论上具有较大的盲目性。以《诗经》研究来说，两千余年的封建的经学观点并未经过严格的批判，只是随着清王朝的覆灭和西方近代思潮的输入，而被斥为反动的、腐朽的思想体系，弃置一旁。其对中国思想领域的根深蒂固的影响并未得到清算，因而变换形态的死灰复燃的可能性依然存在。外国的某种理论、主张传来，也未经过审慎的思辨，考察其是否合于真理性或合于真理性的程度，而是盲目地崇拜名人，盲目地追随所谓的理论先进的国家，道听途说，人云亦云。胡适的“白话文学与古文学、平民文学与庙堂文学”的提法一出，便到处可以见到这种对立的提法；弗洛伊德的学说舶来，《诗经》便成了体现两性心理的谜语；“人民性”的主张输入，《诗经》又成了适于这种标签的机械加工品。赞成与否定的认识都缺少内在的理性基础。因此，又可以随时改变其看法，以赞成

与否定另一些大行于世的理论、主张。

### 第三，以主观臆断代替对《诗经》的客观研究

从上述新的传统观点形成的过程可以看出，人们对《诗经》的认识，很少是对它进行客观地、历史地研究的结果。从胡适到“人民性”常常是以某种成见，某种理念的推演，代替对《诗经》的诠释、研究。人们所重视的是自己的理论、主张及其功利目的。为了这些，可以忽视事物的历史存在，可以曲解历史事实，还可以用自己的大胆想象填充历史文献的空白。于是，一方面可以不经分析地宣称雅颂诗“拿文学价值来说，却是最无聊的”<sup>①</sup>；另一方面又可凭借主观想象断言，孔子删诗“使大量健康的诗篇失传了”。<sup>②</sup> 既已失传的作品，如何知其必为“健康的诗篇”呢？同类思维逻辑的运用颇不乏其例。从这些论述中，人们不难发现主观想象在《诗经》研究中的自由舒展。

总之，《诗经》研究中的传统观点从来就不利于《诗经》研究的深入发展。到了社会科学要求突飞猛进的发展的时代，它更成了禁锢人们思想的桎梏。不突破它的束缚，便不会有《诗经》研究的发展，便不会使《诗经》研究乃至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成为科学。

## 三、对几个理论问题的思考

为了推进《诗经》乃至古代文学研究，认清《诗经》研究中的传统观点的积弊是必要的。然而，这仅仅是问题的一部分。我们还应进而探索和澄清导致《诗经》研究中的传统观点形成中的若干问题，特别是所涉及的理论上的是非。其中较为突出的有这样几点：（一）文学研究中的取舍倾向与求实精神；（二）《诗经》

① 见郭沫若：《简单地谈谈〈诗经〉》。

② 见郭沫若：《中国史稿》，人民出版社1976年。

文本的历史客观性与文学史方法论；（三）文艺创作与精神生产的特点。

### （一）文学研究中的取舍倾向与求实精神

在《诗经》研究的传统观点中，国风获得较高的赞誉。之所以如此，重要原因在于据说它们是劳动人民的作品。“历代民歌是它的嫡传，从汉魏乐府直到近代歌谣都深刻体现了这种精神”。<sup>①</sup>这与前面所引述的“人民大众自己的艺术创作构成艺术上人民性的基础”的论断极其相似，并且更为明显地表现出论者感情上的倾向性。人们把特定历史时代的被压迫阶级（姑且不论那些作品是否为他们所创作），从当时的具体的物质关系和思想关系中抽象出来，以一般的被剥削、被压迫为特征，赋予它以超历史的意义，把周代农业劳动者视为当代无产阶级的不祧之祖，从而对所谓的他们的作品表现出特殊的偏爱、亲善与重视。似乎这样分析问题和认识问题，才与研究中应有的无产阶级立场与感情相适应，同时，再伴以对贵族阶级的腐朽性与反动性的斥责，宣布其作品为毫无艺术价值，才足以表明人们的无产阶级的义愤。

其实，这只是似是而非的误解。毫无疑问，研究者不可避免地会带有自己的感情，也不可避免地回流露出一定的理论观点所造成的偏向。但是，在科学研究中，无产阶级立场和感情，与研究者的科学态度和严格的求实精神，是密不可分的，并且体现于研究的过程中。这是由无产阶级的阶级性决定的。无产阶级是代表最新的生产力的先进阶级，是以彻底废除一切私有关系和私有观念为自己的历史使命的阶级。科学研究是无产阶级实现自己历史使命的斗争的一个方面。无产阶级在革命中没有任何私利需要维护，同样的，在科学研究中也就不需要、不容许以偏私之见代

① 见游国恩等：《中国文学史》。